

汉代长安城的营建规模

——谨以此文恭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大寿

史 念 海

提 要 汉都长安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汉代长安城进行了全面探讨,着重论述了汉长安城的营建规模,分析了汉代长安城兴衰的具体原因。

关键词 汉代 长安城 规模

一 汉长安城作为都城的原委

秦亡汉兴,咸阳隳毁后,代之而起的为汉代的长安城。汉长安城就在渭水南岸,和秦咸阳隔水相望。具体说来,汉长安城乃是在秦咸阳渭水以南的旧址上兴建起来的。因为项羽焚毁咸阳,主要是渭水以北的部分,渭水以南虽有残破,旧址犹存。

汉长安城位于秦咸阳的正南,周丰镐的东北,相距匪远,势同比邻,皆在关中的中心。地位相同,汉代的选择都城却与周秦两代迥然不同。周秦两代皆历经多次迁徙,而后始能分别定都于丰镐和咸阳,汉初对于都城的选择虽有不同的意见,但一经定局,即再无改易。这中间有一最大的差异处:周秦两代皆是在辗转迁徙都城的

过程中逐渐战胜和消灭敌对势力,才有奠定设想和行动,最后才统一当时的全国。汉代则是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才决定建都的所在。

周秦的先世都是由西方向东发展的。灭秦的刘邦和项羽,却是来自东方的楚人。在灭秦的过程中,项羽兵力最为雄厚,可以主宰天下。项羽也曾考虑过他的都城所在。项羽是楚人,他的着眼点是楚国的旧地。他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理由,以彭城为都城。彭城为今江苏徐州市。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乡土观念的表现。这样就招致了沐猴而冠的讥评。

刘邦籍隶丰沛,就是现在徐州市的丰县和沛县,他的从龙之臣大抵都是出身于丰沛附近的人物。同样都具有乡土观念,在当时计议建都时,这样的观念也都显示出来了。就是刘邦自己也不是就没有这样的观念。刘邦初定天下,就打算以洛阳为都。洛阳在函谷关东,这是关东的土地。可是他即皇帝位却是在汜水之阳。汜水在汉济阴郡。济阴郡治所在定陶县,其地今仍为定陶县。县境迄今尚有一高大土丘,人称为汉高祖登基台。不论是定都洛阳,还是登基汜水,都会有一套堂皇的理由。如说汜水的得名,是取其汜爱弘大而润下。汜水最初的得名,未必就是这样的悦耳好听。说穿了实是乡土观念的表现。洛阳为关东土地,距丰沛已较关西的咸阳为近,汜水更在丰沛的近旁,当然就符合刘邦及其从龙之臣的希求。

这种乡土观念后来终于被打破了。打破这种观念的人应该数到娄敬和张良。张良的祖上为战国时韩国世家。娄敬为当时被遣往陇西戍边的士卒。娄敬在路过洛阳时,谒见已作为皇帝的刘邦,提出问题说:“陛下都洛阳,是不是想要和周朝一样的兴盛?”刘邦当然予以肯定的回答。娄敬特别指出楚汉战争中的创伤,认为这是不能和周代成康盛世相比侔的。娄敬因而趁势劝刘邦西都关中秦人的故地,并且指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地,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谿其

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崝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①。蒯敬这番话指出秦的故地，形势险要，土地肥美，人口众多，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如果在那里建都，别的地方就是都因乱离失掉，还可以在当地立业保守。张良赞同蒯敬的建议，并且以关中和洛阳作了比较。当然洛阳也是具有形胜之地，它东有成皋之险，西有崤山崤池之固，背黄河而面伊洛，也是可以恃之固守的。张良对这些虽也作了肯定，但指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张良更进一步称道关中，并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②。张良这样的话，是完全赞同蒯敬的意见的。

刘邦是以武力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因而对于用兵的条件特别注意。蒯敬和张良的说辞也就从四塞军事形势说起。蒯敬只概括点出四塞，张良更具体说到左崤函，右陇蜀。陇蜀在关中之西，距关东稍远一点，崤函之险则是刘邦所熟知的。刘邦灭秦之时，本来是可以取道崤山，进攻函谷关的，由于函谷关的险阻，秦兵尚强，就只好向南绕道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进攻武关。尤其是蒯敬用人相斗所作的比喻，更容易使刘邦动心。以秦地为都就可以扼天下的咽喉和拍打天下脊背，这是从战略上的着眼。刘邦建立大业后，按当时的形势不能不大封诸侯，山东各地就有近乎十个王国。这些国王本来都是从龙之士，可是难保他们不会反侧。如果有所反侧，山东就可能乱离。对于这样的问题，张良提出“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蒯敬提出“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所说都相当中肯，所以刘邦听取之后，就即日命驾，西都关中。

①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②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

这样选择都城的过程,显然和周秦两代不同。过程虽然各异,道理却还是一样的。周初在灭崇之后,就注意到华山之阳和桃林之塞。桃林之塞就在崤山的西侧,也是险要的去处。有此桃林之塞,周人就可以不虞商人的侵扰。秦国建都咸阳之后,就着手建筑函谷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弘农河畔。这是一座险要的关隘。直到南北朝时,酈道元撰《水经注》,在《河水注》中还称道说:“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就在战国后期,关东六国曾不止一次联合攻秦,可是到了函谷关下,就成了强弩之末,不能不收兵退去。

关中不仅是形胜之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就是人力和马匹也都相当充实。娄敬所说的秦地百万之众可具,张良所说的北有胡苑之地,都是指此而言的。所谓胡苑的苑,乃是养马的场所。汉时在上郡、北地等处置苑养马^①。张良于汉初就提到胡苑,可知以前就有这样的设施。关中之北为畜牧地区,马匹的精良一直有名于世^②,称为胡苑是因为良马多出于胡地的缘故。这样的人力和马匹也是刘邦在战争中得到深刻的体会。刘邦初起时,部下当然都是楚人。转战各地后,特别是以关中为基地,和项羽相争夺时,常失军亡众,赖萧何从关中遣军补其阙失^③。从关中派遣的兵卒当然是出自秦人的。垓下之战时,项羽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就惊讶地说:“汉军大概已尽得楚地,怎么能有这么多的楚人”^④?这可能是汉军的诡计,汉军还是以秦人为主力的。

灭秦之役,刘项皆起自东方,其所将士卒殆皆以步兵为主。可能项羽先运用骑兵。楚汉战争时,刘邦败于彭城,还守荥阳,项羽就以骑兵相追击。这时刘邦才开始组建骑兵,以灌婴为骑将。这支新建的骑兵,阻击项羽所派遣的追击的骑兵,并且取得了胜利,接着

①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又卷二八《地理志》。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 《史记》卷五三《萧丞相世家》。

④ 《史记》卷七《项羽纪》。

又以骑兵追击项羽于垓下。骑将灌婴也因此显露头角,为刘邦所重视^①。骑兵需要马匹,这是当前的要务,所以张良就以胡苑之利来说明关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很得到刘邦的赏识。

娄敬所说的“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张良所说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都是就当时国内情势来说的。作为都城,是和国内国外都有关系,不能仅着眼国内的一个方面。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建立,有国内的问题,也有外来敌国的压力。为了对付外来敌国的侵犯,都城的选择也很有关系。如果都城接近敌国,就须时时注意边塞,讲求应付的策略。秦献公以栎阳为都,就具有这样的意义。献公以前,晋国强盛,夺取河西地,且曾越泾水而西,对秦国形成莫大的压力。当时秦国的都城已在泾阳,献公更往东迁,迁到栎阳,这就不仅是抵御来自河东的压力,且欲夺取河西的土地。这事明见于献公之子孝公所颁布的命令之中,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实际上献公以栎阳为都,在抵御外来的压力方面也取得相应的成就^②。娄敬和张良在称道关中可以作为都城时,诚然没有考虑到外来的压力和威胁,但关中更接近于当时强敌匈奴,也就必然起到抗御外来压力的作用。

匈奴之为边患,历时已久。远在战国后期,秦昭襄王已为之修筑长城。那时秦国已以咸阳为都。咸阳距匈奴并非很远,秦国就不能不讲求防御的策略。后来秦始皇更驱逐匈奴,取得河南地(今内蒙古五原、临河诸县及其以南的伊克昭盟等处),移筑长城于阴山之上,才免除匈奴对于咸阳的威胁。秦亡之后,接着是楚汉之间的连年战争,匈奴又复南下,居于河南地,和汉人隔故塞相对立。所谓故塞就是秦昭襄王所修筑的长城^③。这些情况可能是当时议论建都问题时所没有顾及的,稍后才了解到匈奴的河南白羊、楼烦王距

① 《史记》卷九五《灌婴传》。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③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离都城近的,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就可达到都城之下。这样的威胁并不稍低于关东诸侯的叛乱。关东诸侯如果真的叛乱,还可以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之。若是匈奴南侵,又将如何抵御?根据娄敬的建议,由各地向关中迁徙人口。人口多了也是防边的力量。这一次迁徙的就有十余万口^①。

正是因为都城在关中,就不能不面对强敌筹划防御的策略。后来到汉文帝时,匈奴大入侵扰,由朝那(今宁夏固原县南)、萧关(今固原县东南),至于彭阳(今甘肃镇原县东),候骑还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和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北),情况虽然相当危急,都城之中,因为早有准备,还是相当镇静,得以从容调兵遣将,驱逐匈奴出塞。

匈奴南向侵扰关中,危及都城,这是娄敬和张良当时都没有考虑得到的事情。可是都城已经确定在关中,就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正是因为都城设在关中,接近匈奴,大敌当前,就不能掉以轻心。汉代前期和匈奴作过多次的较量,最后终于开疆扩土,制服了匈奴,这还是和都城设在近于其强敌的地方有关。

秦时以咸阳为都城,秦始皇藉此统一了六国并进而驱逐匈奴于阴山之北。汉代在统一了当时的全国之后,建都于长安,是为了可以控制关东,防止诸侯的叛乱,终汉一代,关东并未发生叛乱的事故。建都之时,虽未考虑到匈奴的侵扰,但是还是制服了匈奴。长安和咸阳隔着一条渭水,作为都城所起的作用还是一样的。

二 陆海中的天府之国

娄敬在说刘邦建都于秦之故地时,曾提到:“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张良赞同娄敬的建议,也曾指出关中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这是从经济方面着眼,论述应该建都于关中的道理。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里,首先是说

^①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关中为盛产粮食的所在。这一点是刘邦在和项羽战争中深有体会的。在长达五年的战争期间,汉军所需的粮饷大都由关中供给。刘邦东征,萧何留守关中,经常转运粮食,输送至军前。萧何在战争期间并没有任何汗马功劳,后来天下底定,论功行赏,萧何巍然列为第一功。当时有人提出异议,有一位鄂君就特别指出:“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再加上萧何的往前方输送兵丁和巩固后方,功劳至大,是难得比拟的。鄂君这番话说得入情人理,其他人等也就再无若何话可说了^①。

关中本是从事农耕的地区。周原、雍城、丰镐和咸阳,都是周秦以来的旧业所在。汉代继承前人遗风,更向前发展。特别是秦统一六国以前所开凿的郑国渠,使原来的盐碱地区成为膏腴的良田,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使秦国益加富强,汉代初年也得以承其余绪。楚汉战争期间,萧何能够转输军粮,运往荥阳,使汉军不至于稍有匮乏。这就显示出关中的富庶基础。

张良所说的天府之国是与金城千里并提的。既然说到金城千里,就应该指整个关中来说,包括周原、雍城在内。娄敬所说的天府,也许只限于秦都咸阳的附近。这是关中的中心所在,应该是更为富庶的。

后来到汉武帝时,东方朔说关中的富庶,更为具体。他说:“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浚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也”^②。他所说的汧陇以东,商雒以西,是指整个关中来说的。可是他又指出霸浚以西和泾渭之南。这是汉代都城长安的所在地。长安就在咸阳之南。这样说来,东方朔所说的和娄敬的言辞是相仿佛的。其后班固对此也

①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

②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有解释,他一则说:“鄠杜竹林,南山檀栢,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①;再则说:“陆海珍藏,蓝田美玉”^②。鄠、杜为汉长安城南两个县。鄠县今为户县。杜县在今长安县东北。蓝田今仍为蓝田县。按照班固所说的,则所谓陆海应在汉长安城南,南山之下了。其实班固说汉都所在的长安,范围还是相当广大的。他所说的长安,乃是“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③。看来各家的说法都是相似的。从大的方面说,包括整个关中,最为富庶的还应该是长安近旁南山之下。所谓天府之国和陆海之地也应该是同义语,为了方便起见,可以联系起来说:陆海中的天府之国。

东方朔说到陆海之地,因而就说到其中富庶的物产。他指出:“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栢、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④。班固也指出:长安附近的“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⑤。所说的蜀,指的就是和巴相邻的蜀。为什么长安附近的富庶,能和蜀相近似?因为蜀的土地也是一样的肥美,且有江水的灌溉,形成了沃野,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当地人人有稻鱼,没有凶年之忧^⑥。陆海之地能和蜀地相比拟,是不容易的。

陆海之地有这样繁多的物产,那是可以称为天府之国的。都城所在地有繁多的物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农耕的收获。因为重视农耕,所以称为膏腴的土地也相应得到重视,一亩的土地竟然高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 《文选》卷一,班孟坚《西都赋》。

③ 《文选》卷一,班孟坚《西都赋》。

④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⑤ 《文选》卷一,班孟坚《西都赋》。

⑥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到一金。当时的物价高低,现在不易具体计算,应该说这样的地价是当时最高的,不仅当时形于人口,就是后世提起来也是认为是少有的。后来南朝沈约撰《宋书》,还曾以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带海傍湖的良畴与鄠杜之间的膏土相比较^①,可以略知其肥沃的景象。汉武帝时,丞相田蚡和魏其侯窦婴为了争夺长安城南的农田,相持不下,窦婴竟然还因此引起了杀身之祸^②。

就是这样的天府之国,便成了娄敬和张良建议刘邦建都于关中的理由,刘邦也相信这样的道理,以关中作为都城的所在。至于富庶的农耕地区,在泾渭之南和南山之下以外,还应该增添上郑国渠灌溉的区域,再往后说,更应该增添上白渠灌溉的区域。前面说到萧何转输关中的漕粮以供给在荥阳与项羽相持的汉军,其中的一部分应是仰赖于郑国渠旁的田亩。郑国渠初开凿成功时,就能灌溉盐碱地四万余顷,每亩的收获量竟然多到一钟^③。钟是秦国量的单位,一钟合现在多少斤?未悉具体的数字,还需再作研究。不过应该说这是当时最高的收获量,是难得的丰收。郑国渠灌溉地区离都城虽然稍远一些,但是使天府之国更为充实,确实是毫无疑义的。郑国渠所引用的为泾水。泾水的河谷由于不断的下切,逐渐低于郑国渠的进水口,进水量逐渐减少,降低了郑国渠的作用,这当然会使它的灌溉地区农作物减产。后来白公在郑国渠进水口的上游以谷口为名的地方,另开一道渠,一直通到栌阳,注入渭水,长约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为是白公开凿的,就称为白渠。白渠的效果是很显然的,当地的人民得到富饶的好处,就编成颂美的歌辞,到处歌唱。歌辞是“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渠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

①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②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传》。

③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①。白公开渠在汉宣帝时，已在西汉中叶以后了^②。

天府之国的富庶，确实构成了关中能够作为都城的一个条件。特别是霸浐以西、泾渭之南以至于南山之下，为周秦和汉代先后探求的富庶地区所在。至少当地所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都城中人口的需求。不过这样的满足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都城中人口过多的增加，所需求的粮食超过当地农作物的产量，就难以满足了。当地所产的粮食不够消费，就必须仰给于外地。在郑国渠尚未开凿之前，秦国曾经转运过巴蜀的粮食，萧何镇抚关中之时，也曾取给于巴蜀。但秦岭巴山的栈道千里，转运粮食是相当艰难的。秦统一六国之后，就转而取之于关东各地，最远征发到东海之滨的黄、颍两县（今山东黄县和福山县）和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南）^③，不过征发的粮食乃是为了供应在阴山之下黄河侧畔的防边军队的饷糈，与都城咸阳无关。虽然如此，却也显示出天府之国所能供应的粮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徙天下富豪 12 万户于咸阳，接着到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又徙 3 万家于丽邑，5 万家于云阳^④。丽邑为今临潼县，与咸阳相邻。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离咸阳稍远些，也还是在关中。这 20 万户人家的迁入，当然会增加天府之国粮食的消耗。上面说到秦始皇由黄、颍、琅邪负海之郡征发粮食，那是涉及到很远的地区。较近的郡县自然不能例外。现在河南荥阳县东北那时有座敖山，敖山上置有敖仓，就是用以暂时储存由东南各处征发的粮食。这些粮食

①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池阳，汉县，其故城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谷口即在池阳境内。

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右扶风；周至，灵轵渠、武帝穿也；郿，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入蒙茏渠”。灵轵、成国、蒙茏三渠皆能起到和白渠一样的作用。

③ 《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运到咸阳,也许能够补充当地的不足。

汉初,刘邦因娄敬的建议以关中为都,又因娄敬的强本弱末之术,徙六国君王的后裔及豪杰名家10余万口于关中,又增加了都城中的人口,直到西汉末年,长安城中的户数已在8万以上^①,为全国之最。就是位于关中的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即所谓三辅的户数也是相当繁多的。

都城中的人口的增加,也就难免超过了天府之国的负担,甚至会使天府之国的富庶为之减色。在我国历史上,一般王朝都城所在的地区,所生产的粮食都是难于满足都城的需要的。东汉和魏晋的洛阳,宋代的开封,元明清的大都和北京皆是如此。明初都于江宁(就是后来的南京),当时还修凿秦淮河和石臼湖之间胭脂河,以转输浙东的漕粮^②。因为石臼湖和溧水能够相联系,而溧水下入于太湖^③。这应是演变的规律,无损于天府之国的声誉。

汉代都于长安之后,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也和秦时一样,转输山东的漕粮。这样的问题,张良在劝汉高帝都于关中时就曾经提到过。张良当时说:“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当时转输山东漕粮,是要依靠黄河和渭水。黄河下游,战国时期所开凿的鸿沟,还依然畅通,可以利用。鸿沟的开凿是为了沟通宋、郑、陈、蔡、曹、卫。这些都是当时的诸侯之国。宋国都于商丘,就是现在河南商丘县。郑国都于新郑,就是现在河南新郑市。陈国都城即以陈相称,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初都于上蔡,后徙于新蔡,又徙于下蔡。上蔡、新蔡今仍为河南上蔡和新蔡县,下蔡则为今安徽凤台县。曹国都于陶丘,今为山东定陶县。卫国初都于洹,今为河南卫辉市,其后再一迁徙,都于帝丘,今为河南濮阳市。这些诸侯之国的都城分别在汉时梁国、河南、淮阳、汝南、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 《明史》卷一三二《李新传》。

③ 拙著《中国的运河》第七章《大运河的开凿及其废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沛郡、济阴、河内、东郡诸郡国。鸿沟的开凿是以之与济、汝、淮、泗诸水相会合，故能通到这些诸侯之国。到了汉代前期，这些郡国的漕粮又可以由鸿沟，经过黄河和渭水运到都城长安，就是其他远离鸿沟的郡国，也可以辗转运到鸿沟，再利用水道西运。

汉初，转输山东漕粮以给都城，每年不过数十万石，足敷应用。后来不仅由于都城人口增多，还由于经营西北边地的开支和王朝宫廷贵族的糜费，粮食的需要也日益增多，岁输山东的漕粮因而就相应增加到400万斛，并且成了常规^①。可是转输漕粮的运道也有困难。长安以下的渭水河道多弯曲，其间竟长达900里，漕运不免多费时日。黄河砥柱之险，也就是三门峡一段，水流湍急，漕船不易上溯。有人建议为了避免这样的困难，可以改道转输，山东漕粮改运到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再由汉水上运，经过秦岭的褒斜道，运到都城。褒斜道是循褒水和斜水筑成的，作这样建议的人是设想疏凿褒水和斜水，使之能够行船。两水源头相距很近，如果难于凿通，就是改用陆运也不是很远。

这样的困难，王朝都曾设法解决过。砥柱之险，难于施工^②，这且不要说起。为了缩短渭水河道的距离，当时在长安以下，渭水之南，另外开凿一条漕渠，分渭水东流，这样就可以缩短运道600里，至于疏凿褒水和斜水，当时也曾兴工，只是水多湍石，行船还是不容的^③。

为了增加漕粮的运输，这样的想方设法在当时说来，确是再无他计可施了。为了不使都城中粮食感到困难，只好在这天府之国内设想。开凿长安以下渭水之南的漕渠，固然是为了缩短漕粮的运程。在漕罢之时，还可用渠水灌溉农田；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当时还曾开凿龙首渠，六辅渠和白渠，都是农田灌溉的水利设施。龙首

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水经·河水注》。

③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渠在临晋。临晋为今大荔县。龙首渠引用的是洛水,六辅渠在郑国渠的侧畔,引用当地几条小水以灌溉郑国渠旁的高地^①。白渠是较龙首渠和六辅渠更为巨大的工程,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这些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自然增添了天府之国的富庶。这些渠道,除漕渠的开始一段外,都离当时的都城较远。具体说来,都不在现在西安市的境内。但这些渠道开凿成功后,都能使当时的都城更为繁荣昌盛,其功是不可没的。前面曾经征引过白渠开凿成功后当地人的颂美歌辞,说是“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应不是过谀的谰言,而确是具体的实录。

三 汉长安城的布局及其内外设施

汉代以长安为都城。长安本秦时乡聚,秦始皇以之封其弟成蟜为长安君^②。成蟜以前,秦已有高陵君、泾阳君等封号,所封皆已为县。成蟜为秦始皇之弟,王室贵胄,所封似不以乡聚为限,当是受封之时,改乡聚为县,故后世地理书均以秦县相称^③。长安县在渭水之南,与咸阳隔水相对。正是因为隔水相对,秦时咸阳的宫殿也就越水建在渭南。阿房宫和兴乐宫都应筑在长安。兴乐宫至汉时犹为太后常居的宫殿^④,改称为长乐宫^⑤。

汉初始议建都之时,咸阳虽已为项羽所焚毁,秦的故都栎阳却巍然独存,项羽所封的塞王司马欣就以栎阳为都。楚汉战争之际,刘邦曾数次往来关中,皆居于栎阳。可是娄敬、张良诸人议论建都,皆只说到关中,并未稍一提到栎阳。后来刘邦决定建都关中,即日命驾前往,虽仍居于栎阳,只是暂时的起居。可见当时君臣上下,都

①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雍州》。

④ 《三辅黄图》卷一《秦宫》。

⑤ 《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集解》引《关中记》。

没有以栎阳为都的设想。大致可以说,当时关于都城的概念,可能还是在咸阳。

秦亡汉兴,汉代的江山就是取自秦代。汉初人论秦亡的缘由,都是归恶于秦始皇。如果不说秦始皇不好,汉怎能取而代之。既然如此,为什么选择都城还要继踵于秦时的旧规?寻根究底,这是形势有以促成的。论形势,咸阳位于关中的中枢之地。控制着中枢之地就可以控制整个的关中。控制住关中,就可以控制全国。这就是张良所说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意思。这完全是从军事方面的设想。刘邦以征战建国,深知其中的利害,故能一说即了然于心怀之中。其中的道理虽然如此,可是咸阳已成废墟。在废墟上另建新城,谈何容易。好在当年所焚毁的只是渭水以北部分,渭水以南殆未顾及,故阿房宫、兴乐宫等皆大体完整。这就给汉初建设都城以极大的便利,而且还有长安这个嘉名。正是由于长安是在秦都咸阳部分遗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营建过程也相当迅速。刘邦决定建都关中,是在他的五年(公元前202年),中间只隔一年,到七年(公元前200年),就已大致建成,丞相已下的官府就皆迁入长安城中^①。

其实,汉高帝当时最初营建的只是后来位于长安城中的长乐宫^②。长乐宫在长安城的东南隅,本秦时的兴乐宫,汉初的营建只是增补修缮而已^③。当时接着营建的还有未央宫。未央宫就在长乐宫之西,是在长安城的西南隅^④。当时尚未兴筑城墙,筑城墙是在汉惠帝时。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始筑,其后陆续兴作,至其五年(公元前190年)筑成^⑤。长安城墙的长短和长安城的面积,东汉时卫宏所撰的《汉旧仪》曾有所记载。《汉旧仪》亦作《汉官旧仪》,传

① 《史记》卷八《高祖纪》。

② 《三辅黄图》卷二《汉宫》。

③ 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宫室》引《长安记》。

④ 《史记》卷八《高祖纪》,又《正义》引《括地志》。

⑤ 《史记》卷九《惠帝纪》。

仪凤二年至垂拱三年间，羁縻维州所领县失载。《通典》维州有薛城、定广、小封三县，《元和志》维州有薛城、定廉、盐溪三县。按“定广”当为“定廉”之误，定廉县开元二十八年已析置奉州，《通典》、《元和志》俱不应属之维州；小封乃咸亨间维州刺史董弄招慰生羌新置，盐溪则因永徽间已并入定廉，似不得复出，故清人张驹贤《元和郡县图志考证》云：“盐溪县，旧、新《唐志》及《通典》不载，盖高宗永徽初废入定廉县，而此志载之，或永徽至元和一百六十年间曾又复置，此暨各书俱未详，疑。”今考“《贞元十道录》剑南道残卷”维州维川郡目下仅有“废薛城、小封”二县。所以言“废”，当指广德元年至贞元九年没于吐蕃时事，要是此“《贞元十道录》”资料限于贞元十年以前。于此可见盐溪县未曾复置，仪凤二年至垂拱三年间羁縻维州实有薛城、定廉、小封三县，州治当仍在薛城，《通典》维州所载，乃开元制度，《元和志》维州所载，乃贞观制度。

笮州，本西恭州，诸志皆载贞观七年以内附白狗羌部落置，八年改名笮州，独《通鉴》云：“武德七年正月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此武德恭州，胡三省注“即西恭州”，显然是教人不要混同于开元二十四年由静州析置的恭州，史林《唐代白狗羌探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3期载）却对胡注作了相反理解，误以为胡氏将西恭州混同于开元恭州，而用大量篇幅予以反驳，真所谓“南其辕而北其辙”也。不过，由于《通鉴》所载始置时间与诸志不同，后人亦多不附胡氏之说，或有以武德恭州乃以白兰羌部落置者。今按前引《唐茂州都督府壁记》，“贞观初”已有笮（西恭）州，所谓“贞观初”，当在贞观七年以前，既然贞观七年以前已有笮（西恭）州，那么《通鉴》及胡氏之说显然不误。诸志之“贞观七年”，当为“武德七年”之误，抑或西恭州曾经罢废而于贞观七年复置。又从当时茂州都督府诸羁縻州距京里程看，翼、涂、维等里程较近诸州均置于武德七年以前，炎、彻、向、冉、穹等里程较远诸州均置于贞观五年，西恭州里程介于两者之间，不当落得最晚，总之笔者认为贞观七年不是西恭州始置之年。

殿堂^①。不过作为一代典制来说,长乐宫就不免稍有欠缺之处。因而萧何就另行创建未央宫。秦时兴乐宫西有章台^②。汉初章台当已圯毁,未央宫就在章台的遗址上建筑起来,章台不以宫名^③,大概难与一般宫殿相比侔,因为位于长乐宫西,未央宫的建筑可能就以长乐宫为蓝本。不过规模更为宏大。汉高祖最初在长乐宫接受诸侯群臣的朝拜,对长乐宫并未提出若何的疵议,可是对于未央宫的壮丽宫阙,却大为震怒,指责说:“是何宫室过度也”!萧何作了解释:“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④。可见这东西相对的两座宫殿,还是有很多的差异的。最明显的一点是未央宫更向南扩展,而且扩展的很多,使后来修筑长安城时,南城墙的西段,向外突出了很大一块,这突出的地方就在龙首原上,因而就不能不截削龙首原。

《三辅黄图》叙述未央宫说:“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⑤。前殿是当时帝王受诸侯群臣朝拜之处,故“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并说:“《西京赋》所谓‘疏龙首以抗前殿’,此也”。张衡在《西京赋》中只说到未央宫前殿,班固在《西都赋》中却已经说到未央宫的整体。班固所说的是“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未央宫有北阙和东阙,班固以之与周穆王所筑的中天之台相比拟。为什么又称之为冠山?李善为之作注释,引潘

① 《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

② 《史记》卷七一《樗里子传》:“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汉书》卷三六《楚元王附刘向传》:“樗里子葬于武库”。《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历武库北,旧樗里子葬于此”。近年考古勘察证实,武库遗址就在未央宫之东,长乐宫之西。

③ 文献记载未见以官称章台者,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近得秦时封泥,其中章台封泥即直称章台,不称章台宫。

④ 《史记》卷八《高祖纪》。

⑤ 未央宫周回里数,说者不一。《西京杂记》卷一说:“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宫室》引潘岳《关中记》:“未央宫周旋三十一里”。皆与《三辅黄图》不同。

岳《关中记》所说的“未央宫殿皆疏龙首山土作之”，并谓殿居山上，故曰“冠”云。龙首山后来称为龙首原。现在龙首原北麓已相当漫平，疏凿之处不可复见。不过既为班固、张衡、潘岳诸人所称道，可知并非虚妄。正是因为未央宫是疏凿龙首山建成的，不能和长乐宫整齐划一，长安城的南城墙也就显得多了一些弯曲，南北两城墙都弯弯曲曲，人们就以之与天上的南斗和北斗相媲美^①，长安城也就有了斗城的称号^②。

汉长安城北濒渭水营建。现在渭水的河道在周至、户县以下趋向东北，直至泾渭合流之处，大体都是如此流向。古今河道间有不同处，主要是河身向北摆动，其流向无大差异，汉长安城既系濒渭水营建，则其北城墙也就难得东西成一直线，而是随河道的所至，断续偏向东北。汉长安城北出三门，由西向东，依次为横门、厨城门和洛城门。横门亦称光门，厨城门亦称朝门，洛城门亦称高门，又称利城门^③。横门在今汉城相家巷西，厨城门在今汉城曹家堡，洛城门在今汉城高庙街。厨城门在横门的东北，洛城门又在厨城门的东北。汉长安城北依渭水流向，其南又倚龙首原北麓。龙首原北麓也并非东西成一直线。萧何营建未央宫时，因曾斩截龙首原北麓，汉长安城的南面也就有曲折处，不过和北面不尽相同。汉长安城南出也有三门，由西向东，依次为西安门、安门和覆盎门。西安门亦称便门，也就是平门，安门亦称鼎路门，覆盎门亦称杜门^④。西安门在今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京城章》引《三辅旧事》和《周地图记》。

② 《三辅黄图》卷一《汉长安故城》。

③ 《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曰洛城门，又曰高门”。《水经·渭水注》则谓此门“本名杜门，亦曰利城门”。《三辅黄图》以杜门为覆盎门的另一名称，与《水经注》不同。按：杜门的得名应与杜城有关。杜城在长安城南，正在覆盎门外，则覆盎门一名杜门是合理的。洛城门去杜城绝远，似不宜有杜门之名。

④ 《水经·渭水注》：“覆盎门”南有下杜城，故曰下杜门”。下杜城即杜城，故《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以此门为杜门，是下杜门即杜门。

汉城马家寨南1公里许,安门在今汉城西张村和吕家壕之间,覆盎门在今汉城阁老村南1公里处,其南为大白杨村和小白杨村。这是说安门在西安门的东南,覆盎门在安门的东北。由覆盎门看西安门乃是西面稍偏南些。这里的城墙是由西安门东行,折而向南,又转而向东,经过安门东行,再折而北行,又转而向东,经过安门东行,再折而北行,又转向东,经过覆盎门,安门居中,其东西两侧呈现出一个大弯。

汉时始建长安城也不是无所师法的。汉长安城是在秦咸阳城渭水之南部分遗址的基础上营建的,但并未因循秦咸阳城的旧规。窥其实际,似与《周礼·考工记》有关。当时殆承受《考工记》的遗意,而稍事变通。《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按照《考工记》的制度,都城之中,宫室之外,还应该设有明堂。

如上所说,汉长安城周回六十里,这和《考工记》的方九里之说颇相悬殊。这样的悬殊是势所必然的,而且还不仅这一项。秦汉时期人口较以前为增多,难得悉如旧规。《考工记》所说方九里的都城已经相当宏大,若过份宽广,乏人居住,也是问题。春秋时,梁伯就是因为扩大都城而人口稀少,招致亡国之祸^①。梁伯是诸侯之国,都城应该是更小的。秦汉时人口已大为增多,方九里之城显然容纳不下都城之中的人口。汉长安城夹处于渭水和龙首原之间,难得有所扩展。不然,还可能再扩大一些。

汉长安城的周回较《考工记》所说为大,但城门的设置却还是按照《考工记》的规定,每旁三门。每旁三门,合为十二门。汉长安城就是设置了十二座城门。北面三座城门和南面三座,上文已逐一提到。这里还应该继续说到东西两面的城门。东面的三门,由南向北,依次为霸城门、清明门和宣平门。霸城门亦称青绮门,或青城门、青门。清明门亦称藉田门,或凯门。宣平门,民间俗称东都门。

^① 《左传》僖公十八年。

霸城门在今汉城樊家圪塔东 2 公里许;清明门在今汉城北玉女村东约 100 米;宣平门今称青门坊^①。这三座城门由南到北排列成一直线。西出的三门,由南向北,依次为章城门、直城门和雍门。章城门亦称光华门,又曰便门。直城门本名直门,也有称为龙楼门的。雍门本名西城门,民呼曰函里门,亦曰突门^②。章城门在今汉城延秋门村东南约 1 公里;直城门在今汉城周家河湾北,夹城堡南;雍门在今汉城六村堡一带。这西面三门并非和东面三门那样南北成一直线,而是章城门较之直城门和雍门都稍稍偏西一点。因为汉长安城西有沣水及其支津流过,对于都城的营建也就有了影响。未央宫之北为桂宫和北宫。桂宫在西,北宫在东,桂宫之西的一段西面城墙,就向内收缩,直至雍门之北。由雍门之北更斜向东北,过今相家巷和北面的城墙相连接。

《考工记》所说的匠人营国,只说到城,没有说到郭。古代的城一般说来是有郭的。孟子就曾经说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③。汉长安城城门之外,亦有郭门。见于记载的有宣平门和横门的郭门。宣平门就是民间所谓的东都门,其郭门就称东郭门^④。横门外的郭门还非仅一处,都门之外,又有棘门、通门和亥门^⑤。其他各门则未见提到。王莽改制,长安城的城门名称也在更改之列。王莽所改的城门名称之下皆附有亭名,例如宣平门就更为春王门正月亭。说者谓此亭名就是郭门的名称。这样的说法是不合乎事理的。《水经·渭水注》叙十二城门,说到王莽所改的城门名称,即与郭门无关。其说宣平门,在说过“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后,才说“其郭门亦曰东郭门”。这显然可见王莽并不是改东郭门为正月亭。其说横门,

① 《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水经·渭水注》。

② 《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水经·渭水注》。

③ 《孟子·公孙丑下》。

④ 此东郭门《三辅黄图》原作东都门,陈直《三辅黄图校注》据《玉海》改。

⑤ 《水经·渭水注》。

也是在说过“王莽更名霸都门左幽亭”之后，才说“其外郭有都门、有棘门”，还说“又有通门、亥门”。同样左幽亭和这几个郭门没有关系。如果说，王莽确是改东郭门为正月亭，则王莽如何能改都门、棘门和通门、亥门四座郭门为一个左幽亭？

如果按照所说王莽改动城门名称中的亭名为郭门，则每一门外就都有了郭门。可是整个汉长安城外的郭门都筑在什么地方，却未见诸记载，亦未闻考古方面有若何发掘。这里只能就宣平门和横门的郭门稍作论列。横门的四座郭门，今能确知其处的只有棘门。汉文帝六年（公元前 174 年），匈奴入上郡、云中，祝兹侯徐厉督军驻棘门，与驻于细柳的周亚夫和驻于霸上的刘礼共同备胡^①。则棘门也是军事要地。据说棘门在渭北，本秦时宫门^②。长安城的郭门乃在渭北，郭墙筑于何处，殊费猜疑。横门北的渭桥，在长安城北 3 里^③。此所谓 3 里自当指汉时里制而言。汉时的里较现在的里为小。现在 3 里也已很是短促，用汉里计算，当然更为短促。渭桥筑于渭水上，3 里当是从渭水河岸算起。就是说汉长安城和渭水之间的是很狭窄的。这样狭窄的地方已经筑了一道城墙，还有多大的地方再筑一道郭墙，而且棘门还设在渭北。宣平门的东郭门，据说在宣平门外 13 里^④。这样的说法欠妥。汉太尉夏侯婴墓就在宣平门外，距城 8 里^⑤。大尉的冢墓如何能埋葬在郭门之内？就是说在郭墙的近旁也是不与事实相符的。这样说来，宣平门外东郭门距城最多也只能是 6 里或 7 里。就以六、七里来说，也是不宽阔的。汉长安城西面的章城门和直城门之西为建章宫。建章宫在沕水西侧。为什么营造建章宫？据说：汉“武帝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

① 《史记》卷一〇《文帝纪》，《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 《史记》卷一〇《文帝纪·集解》引苏林说。

③ 《史记》卷一〇《文帝纪·集解》引徐广说和孟康说。

④ 《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

⑤ 《水经·渭水注》。

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通上下。辇道为阁道,可以乘辇而行”^①。这里只说跨城,并未涉及跨郭。建章宫虽在城外,与未央宫的距离,较之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还邻近。建章宫在未央宫之西,隔着城墙还有一条沕水,如果这里有郭墙的话,这里的郭墙到底建筑在什么地方?难道不能令人置疑?

情势如此,当时长安城外可能就没有围绕城墙再筑一条围绕全城的郭墙。如果有郭墙,大概只是筑于横门和宣平门两门之外。特别是在章城门和直城门之外,更是无地可筑郭墙的。可见以王莽改变的城门名称及所附的亭名,并非郭门名称,不能以此推论,谓汉长安城周围都围绕有郭墙,况且王莽改制并非都是实事求是,未可据以论述西汉一代的制度。

就是有郭墙,郭墙与城墙之间的土地也并非就很宽敞。上面所说的横门北距渭水只有3里,则厨城门和洛城门也应都是一样的,因为皆濒渭水。这里的渭水固然趋向东北,可是长安城墙也向北推进。宣平门也就是东都门的郭门之间可能较为宽敞,总不能宽到8里,更不能宽到13里。宣平门和横门皆是当时主要交通道路所经过的城门,经过宣平门向东的道路,一直通到函谷关以东各地。这就可能使宣平门至其郭门之间更为广大些。

就是按照这样估计来说,所谓郭的范围,具体是横门和宣平门外,并不是很大的。加上厨城门和洛城门外,也是有限的。有的人竟以此和汉长安城相对比,说汉长安城为内城,这样一隅之地的郭城为外城。苟如此,内外之间岂不是太不相侔了。就是这样太不相侔的一隅之地并不是皆能住人的。汉武帝时,史皇孙及王夫人遇难于巫蛊之祸,其后汉宣帝为之迁葬,并为之立悼园,悼园就在宣平门外的东郭门。立悼园后,益园民千六百家,并立奉明县,以奉二园^②。可知这里在此以前,就没有住过多少人口。因为立了悼园,才

① 《三辅黄图》卷二《宫室》。

② 《水经·渭水注》。

迁来了许多人口,而这许多人口,却隶属于奉明县,与汉长安城内的人口无关。不仅如此,汉长安城北出的洛城门,也就是由西向东的第三门。据记载,门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①。汉长安城北濒渭水,渭水可以通航。由渭水下游乘船西来的人,首先达到洛城门。洛城门外有客舍,也是常理,但不能因此而谓洛城门外的人为数很多。在全城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根据这样一些道理,可以说郭墙之内虽有居人,但所居的人口不会是很多的。一般说来城内的人口总是多于城外郭内的人口。当然也会有特殊的情况。能有特殊的情况,是因为有特殊的条件。可是汉长安城的郭内就缺乏这样特殊的条件。因而不应该说,汉长安城外郭墙之内人口是很稠密的。更不应以这里作为外城,以之与内城相提并论。至于说内城是政治中心,外城是经济中心,也是想当然的说法,因为在文献记载里,并未见到更多的有关证据。所能见到的只是洛城门外有若干客舍而已。

上面说到汉长安城的城门,四面共十二门。这是符合《考工记·匠人营国》旁三门的记载的。可是与所谓的“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就不易一一符合了。国中能够有九经、九纬,前提条件是要旁三门皆两两相对。可是汉长安城的十二门并不是都能两两相对。这是因为汉长安城是在秦时兴乐宫的基础上营建的。修整好兴乐宫,使之成为汉时的长乐宫,接着又比照长乐宫,营建未央宫,再然后建筑城墙,这就难得统筹了。据说汉长安城中有八街九陌。这些街有香室街、夕阳街、尚冠前街,还有华阳街、章台街、藁街、又有城门街和太常街。华阳街为汉武帝时丞相刘屈氂妻臬首处,章台街为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走马的街道,藁街为汉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所斩匈奴郅支单于的悬首地方^②。章台街为汉长安城中最长的街道,由安门一直向北,但北面城墙无门与安门

① 《水经·渭水注》。

② 《三辅黄图》卷二《长安八街九陌》及陈直《校注》。

相对,故章台街只能通到宣平门内的街道。章台街位于尚冠里京兆尹治所之东,故张敞得以在这条街上走马。香室街在明光宫南。明光宫东南为清明门,则香室街为清明门内的街道,这条街道向西与章台街相接。夕阳街在右扶风治所之南,其东接章台街,西通雍门。由于雍门和清明门并不对称,故夕阳街较香室街稍稍偏北一点。尚冠前街据说在夕阳街之后,也就是说在夕阳街之北,夕阳街之北就是横门。考古发掘其间并无街道,有之则是宣平门内的街道直西抵厨城门旁。近厨城门的一段,就在夕阳街之北,宣平门内的街道未见有名称的记载,是否就是尚冠前街亦未可知。或谓尚冠前街与尚冠里有关,当在其近旁。汉宣帝少时曾居尚冠里,其所在亦未有确址,或谓即在京兆尹治所附近。京兆尹治所之北为武库,如所云则尚冠前街也许可能就在京兆尹治所和武库之间。华阳街为横门内的街道,其南与藁街相接。藁街则为直城门内的街道,就在未央宫之北。直城门东与霸城门遥遥相对,为汉长安城内仅有的景象。是否藁街就在直城门和霸城门之间?实际上恐非如此。霸城内就是长乐宫。长乐宫是由秦兴乐宫修整后改称的,霸城门的设置远在其后。后来设置的城门如何能在已成的宫殿中开辟一条道路?考古发掘,直城内通过长乐宫是有一条道路,不过这样一条通过宫中的道路,恐难与一般街道相比拟,也未有一定的名称。八街之中的太常街,据说在长乐宫南,但东不过覆盎门,至于城门街,则已无可考矣。

汉长安城四面各有三门,各门之内应该各有一街,可是具体见于记载的街道却只有上面所说的八街。这八街有关的城门,只有安门、清明门、雍门、横门、直城门等五门。东面宣平门、霸城门内的街道皆无名称,这是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北面的厨城门和洛城门内的街道亦无街名,则更不知其底蕴。南面的覆盎门、西安门以及西面的章城门更为特殊,似难与其他各门一律对待。覆盎门内为长乐宫。西安门内和直城内皆为未央宫,就是说西安门在未央宫之南,直城门在未央宫之西。既有城门当然就有道路,只是这样的道

路都通到宫中，城门也就成了宫门，因而就不是一般人所都能通行的，更说不上街道的名称了。

如上所说，汉长安城十二座城门的设置，是和《考工记》所规定的旁三门相符合的。由于地形的限制，这东西和南北的各三门都不相对称，因而就难得九经、九纬，经涂九轨了。虽然如此，汉长安城的规划还是很致密的。《三辅黄图》记载《都城十二门》时，征引《三辅决录》说：“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十二门三涂洞辟，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又征引班固《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和张衡《西京赋》所说的“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以见其间的规模。所谓“三涂洞辟”，“披三条之广路”和“参涂夷庭”，都是说每一城门都有三个门道。除中间的一个门道外，两侧还各有一道。虽然不是“经涂九轨”、“方轨十二”，也是一时少有的。

《考工记》所说的匠人营国，还特别提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汉长安城的营建，在这一点上还基本上按照《考工记》的成规。汉时九庙和社稷皆在长安城南，其遗址经考古发掘，在今西安城玉祥门外大庆路西段。九庙在东，社稷在九庙西南。这是左祖右社了。只是当时是在汉长安城南，而不在城内。未央宫已直抵长安城的南城墙，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九庙和社稷就皆建在城外。虽在城外，还是符合左祖右社之说的。《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夹横桥大道。”横桥就是横门外渭水上的桥。横桥大道就在横门之内，直南为未央宫。未央宫和东市、西市南北相望，这就是面朝后市了。

应该说，汉长安城的营建，基本上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规模，前后相承袭，只是方九里和九经、九纬略有违异，这是情理和地势使然，不能说是有意的更改。

汉时未央宫是大政朝会之所，就是《考工记》所说的朝。这是长安城内主要的建筑，其他宫殿、官署都起到相应配合的作用。未央

宫为萧何所创建。萧何为此特立了东阙、西阙和前殿。《三辅黄图》记载此事,并征引刘熙《释名》说:“阙在两门旁,中央阙然为道也,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接着还说:“未央宫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在北阙焉。是在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阙东门。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盖萧何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这段话为后来颜师古注《汉书》所引用,可见是相当重要的,也应是符合实际的。萧何是否以厌胜之术造未央宫,已经难于稽考。不过未央宫建于龙首原下,当时为了建未央宫,还削凿过龙首原。未央宫和削凿后的龙首原之间,还筑有一道城墙。因而未央宫不可能再在宫南另建南阙,同样,未央宫之西就是西城墙,也不可能再建西阙。这样道理很简单,用不着以厌胜之术来解释。普通人建立宅第,也不会在有阻隔的地方建立大门,遑论帝王的宫殿。

未央宫的北阙为正门,还另有东阙。为什么又有东阙?《三辅黄图》说长乐宫,谓高帝居此宫。后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宫。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高帝居长乐宫,却在未央宫主持大政,则未央宫有东阙就是应该的。高帝以后,各帝的太后都居长乐宫,各帝往长乐宫省视,也是不会绕道北阙的。武帝时,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发生了争执。两家皆是帝室的外戚。武帝就说:“俱外家,东朝廷辩之”!这是说,到长乐宫太后处辩论。长乐宫是这样的重要,则为了帝王行动的方便,未央宫于北阙之外,又立了东阙,应该说是正常的。

未央宫立的北阙和东阙,并不等于说未央宫就是东向;也不等于说未央宫东向了,汉长安城也相应地东向。《三辅黄图》说:“未央宫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又说:“长乐宫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深十二丈”。这里所谓深,当然是指南北的宽度。这样的构造显然是南北向的宫殿。而非东西向的宫殿。长乐宫为秦时所建,未央宫建于汉初。未央宫应是依据秦时的旧规,只是较长乐宫长七尺,宽三丈而已。《三辅黄图》说长乐宫,除过说东西之长和南北之

深之外，还特别指出：“两杼中三十五丈”。杼字一作序。两杼是指东序和西序。这是说两序合起来共为一十四丈七尺。两序之间相隔三十五丈。既然说明白长乐宫还有东序和西序，更可见长乐宫是南北向的宫殿，不是东西向的宫殿。《三辅黄图》没有记载未央宫的两杼，可是就其遗址看来，还是有两杼的。遗址显示其北部较高，其南部较低，南部的建筑是在东西两侧，不似北部的独当一面，这显然是有东序和西序的。未央宫是按照长乐宫的规模建置的，长乐宫有东序和西序，未央宫就不应该独缺这一重要环节。

长乐宫和未央宫虽建于秦汉两代，其设计思想，却是远绍自西周初年，《尚书·顾命》记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事。康王初见大臣时的设置，是牖间南向，西序东向，东序西向。孔传：牖间是天子见群臣覲诸侯之坐。东西厢谓之序，此养国老饗群臣之坐。可见宫殿之作南北向，远自周初就已如此，源远流长，秦汉正是遵循旧规，并非新创。

以前人说，帝王是南面而治天下。这句话最早见于《周易·说卦》。《说卦》说：“帝出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接着又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所谓圣人指的就是帝王。这是说，南面可以毕见万物。说的是万物，当然民人也都包括在内。这样的思想从那时起，一直流传到很远的后世，无所改易。如果说长乐宫和未央宫都因阙门不在南方，而谓这两座宫殿都是东西向的建筑，不仅与当地的地势不合，也不符合传统的思想和文化。

汉长安城周围的城墙，虽屈曲转折，不成规矩，大体说来，东西略宽，而南北稍窄，这是南北向的城，而不是东西向的城。城内的宫殿主要是长乐宫和未央宫，还有桂宫、北宫和明光宫。《三辅黄图》说桂宫，谓在未央宫北；说北宫，谓近桂宫，俱在未央宫北。这两座宫的方位，皆依未央宫来显示，而不以全城作说明，这就可以说未央宫是最为主要的宫殿，以之定方位，足以见全城内的轮廓。可是

说明光宫,却是说在长乐宫后,南与长乐宫相联属。长乐宫也是最为主要的宫殿,只是稍次于未央宫。这里并未说明光宫在长乐宫北,而只是说在长东宫后,这显然是就全城的轮廓来说的。这样以前后相称,显然可见汉长安城是南北向的城,而不是东西向的城。况且宫殿都是南北向,汉长安城自不应和宫殿的布局相背,另形成东西向的布局,如果汉长安城真的是东西向,则当朝帝王南面而治天下的话,岂不是也就落空了。

其实以南北向的规模来建筑都城也不是秦汉时新创的。前面曾经征引过《周礼·考工记》所说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就已经为汉长安城的南北向定下规模。前面已经证明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是祖述《考工记》的。如果汉长安城为东西向,则汉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就不应该在未央宫和桂宫、北宫之北,而左祖右社就应该在未央宫之东了。可是实际上汉时的社稷和九庙,皆在汉长安城南,也是在未央宫之前的。

未央宫为汉长安城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宫殿,周回二十八里。其中殿阁至少有三四十座。长乐宫次之,周回二十里,其中也有六七座宫殿。桂宫又次之,周回十余里,宫内也有一座明光殿。北宫和明光宫未见有周回里数记载,可能规模较为狭小^①。不过就整个汉长安城来说,只是其中的一些部分。因为汉长安城周回就有六十五里。除过宫殿之外,其余就是街市闾里了。前面已经提到汉长安城有九市和八街九陌,还应该指出城内还有许多闾里。《三辅黄图》说:“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成、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当时闾里的名称流传下来的可能就是这几个。西晋时潘岳撰《西征赋》,说到长安城中的闾里,也只举出这几个名称,并说:“皆夷漫滌荡,亡其处而有其名”。就是说这几个闾里名称也难于指其确地了。前代学人为汉长安城作图,可能因为这许多闾里名称难于确指,也不易指出其确

① 这些殿名分别见《三辅黄图》和宋敏求《长安志》有关各卷。

地,图上就多以宫殿为主,而一些宫殿范围又往往失之过大,这就不免于人以错觉,仿佛长安城里只有宫殿,没有更多的民居^①。其实这样的错觉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的都城,皆有人家在宫阙之间^②,当然汉长安城也不是例外。汉长安城安门之内的章台街,为一条几乎纵贯全城的大街,其北段西有北宫,其中、南两段东有长乐宫。可是作为京兆尹的张敞,却走马于章台街^③。如果章台街两侧皆是宫殿,宫墙高耸入云,街旁又别无人家,张敞为什么要在那里走马,招人訾议?

当时不仅近宫殿的街道两旁有人家,就是宫殿与宫殿之间也有相当宽绰的地方。未央宫和长乐宫东西相望,却不是紧相衔接。《三辅黄图》说,京兆尹的治所在故城南尚冠里。故城就是汉长安城。这里说尚冠里就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如果未央宫和长乐宫紧相连接,尚冠里和京兆尹的治所就不能在城南了。《三辅黄图》又说,左冯翊在故城内太上皇庙西南,而太上皇庙则在香室街南。香室街就是清明门内的街,其北为明光宫,可见长乐宫和明光宫之间也有广大的空地。就是未央宫之北的桂宫和北宫之间也是如此。《三辅黄图》说桂宫,谓其近北宫;说北宫,也是谓其近桂宫,可见两宫并非连在一起。楚汉战争时,夏侯婴曾在疆场间救护过惠帝和鲁元公主,吕后和惠帝因此对夏侯婴都颇为感激。“乃赐婴北第第一”。颜师古解释这北第第一,说是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④。未央宫有北阙和东阙,群臣上书奏事谒见,皆在北阙。北阙实为未央宫的正门,吕后和惠帝赐夏侯婴以北第,是因为北第最接近皇

① 现在所能见到的前哲时贤所绘制的汉长安城图,于邻近城墙的宫殿,率皆绘其宫墙于城墙之侧,相距甚近,仿佛其间并无隙地。这是欠妥的。不过当前对汉时宫殿四至尚未能具体确定,难得逐一改绘,只能说是示意,不能因此就说宫殿之旁就了无隙地,甚至城内的民居也受到影响,不能过多。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皇城》。

③ 《汉书》卷七六《张敞传》。

④ 《汉书》卷四一《夏侯婴传》。

宫,显示和其他臣子不同。北第在北阙之外,确是离皇室最近的地方。还应该指出,夏侯婴受赐的宅第以第一相称,则北阙之外的宅第应该是相当多的。张衡《西京赋》中有句说:“北阙甲第,当道启直”,就是具体的说明。与此相似的,还应该提到明光宫以北的地方。明光宫在长乐宫北。其周回里数未见记载,也许和桂宫,北宫相仿佛,不能和未央宫、长乐宫相比拟。桂宫之内还有些别立名称的宫殿,明光宫却未见相似的记载,就是有这样的宫殿,也不会很多。明光宫在香室街之北,香室街在清明门内。清明门在汉长安城东面三门中的中间,其北还有宣平门,明光宫之北未见有其他建置的记载,可能都是民居。这里还应该略一提及,汉长安城南面三门中的安门。长安城的南城墙在安门东西向外突出,不与其他各门相同。安门之内为章台街的南段。这里章台街之西,距未央宫稍远,为京兆尹治所所在地,这是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章台街之东为长乐宫。长乐宫之南已近安门之东的覆盎门,距安门尚远,当时在这里建有高庙^①。高庙和太上皇庙相仿佛,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却都不会像宫殿那样的宏大。太上皇庙附近还有左冯翊的治所,高庙附近未见有关设置的记载,也许就是一般的民居了。这里琐琐论述只是说明一点:汉长安城内的宫殿虽居有主要的位置,却不是满城都是宫殿,宫殿以外,除过官署、宗庙、市廛等外,应该都是闾里了,这么多的闾里,是可以容纳很多人户的。

后来到了北周时,庾信撰《哀江南赋》,还曾提到他在长安,“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②。宣平为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宣平门内未见有若何建置的记载。长乐宫后有明光宫。长乐宫东北为清明门。明光宫当在清明门内,与宣平门内无涉。宣平门内的广大地区,应皆是闾里的所在,其中贵里可能不少,故庾信特以为言。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宫室三》引《三辅黄图》说:“高庙在长安城中西安门内东太常街南”。与今本《三辅黄图》不同。

② 《庾子山集》卷一。

《哀江南赋》撰于北周之时，赋中所说的贵里，是否为北周时的新规？这不是没有可能。但庾信在说到“望宣平之贵里”后，接着就说：“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絃歌于许、史”，分明是以汉时这些达官贵人，都是这里贵里的主人。揆之史实，也许所说的大将军、平津侯以及金、张、许、史的宅第不一定都在宣平门内，但宣平门内有贵里，应该不是庾信的虚语。

前面曾经指出，汉长安城周回六十里，这是相当宏大的规模。就是这样宏大的都城，到汉武帝时就已显得狭小了。武帝时所建筑的建章宫，就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建章宫周回三十里，较未央宫和长乐宫都更为宏大。建章宫之外，还有社稷和九庙。社稷和九庙在汉长安城南安门和西安门之外。九庙之东还建有辟雍和明堂，皆在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辟雍、明堂之南，隔着昆明渠还建有圜丘。辟雍为天子所设的太学。明堂为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圜丘则为天子祭天之所。这些建置虽然都在长安城外，实际上都应长安城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在一起。

汉承秦制，长安城外也有离宫，为数之多，更远超迈秦时。秦时咸阳以西至于雍城，离宫就已多至三百^①。汉时“郡国宫馆，百四十五，右极周至，并卷丰鄠”^②。确实是十分繁多的。汉时宫馆自然是适时的建筑，就是秦时的一些离宫，汉时依然为临幸之所。汉武帝曾经行幸宜春宫^③。宣帝曾经行幸萑阳宫^④，成帝亦曾行幸长杨

①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文选》卷二《西京赋·注》引《三辅故事》：“秦时殿观百四十五所”。

② 《文选》卷二《西京赋》。又卷一《西都赋》说：“前乘秦岭，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

③ 《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

④ 《汉书》卷八《宣帝纪》。

宫^①。宜春、茝阳、长杨皆秦时的离宫。宜春宫当在今曲江池畔^②，茝阳宫有今户县西南^③，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南^④，汉时离宫有的距长安城相当遥远，如甘泉宫在今淳化县北，扶荔宫在今韩城县南^⑤。在今西安市区及其附近的亦殊不少：钩弋宫在汉直城门南，为汉武帝赵婕妤所居之宫^⑥；汉武帝陈皇后所居的长门宫，也是一座离宫，在今西安市东北赵村东^⑦。昭台宫在上林苑中，为宣帝霍后废处之所^⑧；成帝许后亦曾废处于此^⑨；其遗址当在今西安城西三桥镇高窑村附近^⑩。储元宫在长安城西上林苑中^⑪，为元帝时信

①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

② 《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二年，诏罢宜春下苑”。师古注引孟康记：“（宜春）宫名也，在杜县东”。又引晋灼说：“《史记》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并说：“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池是”。案：今曲江池西南有传说的秦二世冢。

③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鄠县有茝阳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秦茝阳宫在（鄠）县西南二十三里。”

④ 《三辅黄图》卷一《秦宫》：“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

⑤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镇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

⑥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孝武钩弋赵婕妤传》师古注：“《黄图》钩弋宫在城外，《汉武故事》曰：在直门南也”。今本《三辅黄图》无“城外”二字。直门当即直城门。直城门为长安城西出三门中的中间城门。其南直至章城门之间，西为建章宫，东为长安城西城墙，无地可容钩弋宫。其确地容再考核。

⑦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孝武陈皇后传》。《三辅黄图》卷三《长门宫》：“长门宫，离宫，在长安城”。既云离宫，就不应该还在长安城中。及门徐为民君撰《西汉上林苑宫殿台观考》（《文博》1991年第4期），考得长门宫遗址在今西安市东北赵村东。

⑧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孝宣霍皇后传》。

⑨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孝成许皇后传》。

⑩ 西安市文管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出土铜器中有昭台厨铜，当为昭台宫厨中的用器，昭台宫遗址应在其附近。

⑪ 《三辅黄图》卷三《储元宫》，《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颜注。

都太后与信都王的居所^①。犬台宫亦在上林苑中,距长安城二十八里,武帝在这座宫中曾召见过江充^②。葡萄宫在上林苑西,哀帝时匈奴单于来朝,曾居此宫^③,当在今周至县境^④。五柞宫以宫中有五株柞树得名,与秦长杨宫的得名相似,在今周至县东南 38 里,与长杨宫相近^⑤。宣曲宫在昆明池西,武帝微行游猎时,途中曾在此宫休息^⑥,黄山宫在今兴平县北,池阳宫在今泾阳县东南,武帝微行,曾北至池阳,西至黄山^⑦。鼎湖宫在蓝田县,武帝曾因染病憩于此宫^⑧,其遗址今已发现,在蓝田县焦岱镇西南一所砖瓦窑旁,不佞曾亲赴其地考察过,出土汉砖为数甚多。这里还应该提到荣宫。荣宫之名不见于《三辅黄图》,仅见于发现的铜方炉上的刻字。铜方炉发现于西安东郊延兴门,则此宫遗址当在其附近^⑨。

离宫之外,还有苑囿。汉时长安城外的苑囿以上林苑的规模为最大。上林苑本秦旧苑,秦亡后也相应荒废。汉武帝才又复设置起来。因为是秦时旧苑,汉时君王又频繁巡幸,故颇为当时后世所称道。其确地所在,说者不一,所说亦颇有差异,难得一致。当时起苑的曲折,具载于《汉书·东方朔传》。《传》中说:“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当时东方朔在侧,因进谏说:“今

① 《汉书》卷九九下《外戚·孝元帝冯昭仪传》。

② 《汉书》卷四五《江充传》。

③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④ 《三辅黄图》卷三《葡萄宫》:“在上林苑西”。

⑤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周至县》。

⑥ 《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又卷六五《东方朔传》。

⑦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⑧ 《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三辅黄图》卷三《鼎湖宫》说:“在湖城县界。又一说在蓝田”。蓝田既有鼎湖宫遗址发现,则湖城之说自属非是。

⑨ 秦波《西汉皇后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文物》1973 年第 3 期。

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周至、鄠、杜乎”。可见当时所规划的上林苑，只是在周至鄠、杜诸县间，具体说来，就是周至以东和宜春以西。周至就是现在的周至县，宜春则在今曲江池畔，当时属于杜县。杜县治所在今长安县西北。鄠县今为户县，位于周至和杜县之间。这应该没有什么讹误。特别是东方朔的谏诤之辞不会有什么差错。东方朔进谏之时，正是汉武帝为起上林苑而相当兴奋之际。汉武帝是相当英明的君上，东方朔如何能在他为此事而兴奋的时候，当面提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言辞？因而对于所说的上林苑在周至、鄠、杜的话，用不着多所怀疑。

诸家有关上林苑的不同记载也不是没有来由的。《汉书·东方朔传》在叙述汉武帝起上林苑之前，就有过关于其微行的记载。记载说：“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池阳、黄山两宫皆已在渭水之北。上林苑的设置虽因武帝微行而起，《东方朔传》只是藉以说明起上林苑的缘由，并没有说最初微行的地方都包括在上林苑的范围之中。《东方朔传》说的十分清楚，不是混在一起的。西汉末年，扬雄为了撰《羽猎赋》，却把两宗事联系起来。《汉书·扬雄传》记述扬雄的话说：“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溯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扬雄撰《羽猎赋》也是为了谏诤汉成帝的羽猎，其中就不免有夸大之辞。扬雄不仅以北绕黄山，溯渭而东，夸大上林苑，甚而还说：“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吸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都包括在内，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这样不同的记述，值得相信的是正在起上林苑时的东方朔，而不是远隔若干年以后的扬雄。

像扬雄这样扩大上林苑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也不必为之缩小。如上所说，上林苑是在宜春之西。汉时以宜春为名的有宫也有观。宜春宫在今曲江池畔，观则在鄠县涝水之西泮陂之南。因而所说的

上林苑就只能在涝水之西^①。这样说来,上林苑就与杜县无关了。这一点,唐人颜师古的论证是恰当的。颜怀古说:所谓汉武帝的东游宜春,乃“宜春宫也。在长安城东南,说者以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观耳,在长安城西,岂得言东游也”^②。

上林苑之外,还有御宿、思贤、博望、西郊、乐游诸苑以及宜春下苑。御宿苑就是上林苑中的御宿宫及其附近。当地有川水,也就称为御宿川^③。御宿川出今石砭峪,就是漓水。今漓水在香积寺南与沔水相合。沔水本是独流入渭,与漓水相合,乃是后来改引的。虽说如此,至少在此以上的漓水都应在御宿苑范围之内。思贤苑为汉文帝为其太子所立,博望苑也是汉武帝为其太子所立,都是为了使其太子能在苑内接待宾客,可能皆非过于宏大。思贤苑未知所在,博望苑则在汉长安城南,杜门外五里处^④。杜门即覆盎门,为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一门。博望苑在杜门外漕渠之北^⑤。于唐长安城,则在朱雀门大街西第四街金城坊内^⑥,也是在唐长安县治所之北五里^⑦。以现在舆图按之,当在玉祥门外任家庄附近。乐游苑为汉宣帝所起,在杜陵西北^⑧。唐长安城朱雀门大街东第四街升平坊东北隅有汉乐游庙,即置在乐游苑的高原上^⑨,今大雁塔东北高地犹称为乐游原。宜春下苑在唐长安城东南隅曲江^⑩,也就是现在的曲江池。宜春苑为上林苑最东之地,这里称为下苑,可能就指今曲江池而言,因曲江池在当地最为低下。宜春下苑和御宿苑都在上林苑

① 《水经·渭水注》。

②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注》。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

④ 《三辅黄图》卷四《苑囿》。

⑤ 《水经·渭水注》。

⑥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唐京城四》。

⑦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

⑧ 《三辅黄图》卷四《苑囿》。

⑨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

⑩ 《汉书》卷九《元帝纪·注》。

中。当是当时有此设置,因而另立名称。这里还应该提到西郊苑。西郊苑见于《三辅黄图》。《三辅黄图》在其《苑囿》章中特为西郊苑列有专目,并说:“汉西郊有苑囿,林麓薮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百余所”。汉长安城西郊为建章宫。建章宫周回就有二十余里^①。所占的地区已是相当广大,更从何处设置西郊苑,而且有的记载还说,建章宫还是包括在上林苑之内^②。如上所说,上林苑就在汉长安城西,距城才十有余里。其间如何还能再建西郊苑?所说的四百余里的周垣和三百余所离宫别馆,仿佛就是上林苑,不过较之上林苑还要宏大,当是撰者误记。

四 汉长安城的残破与隳废

西汉以长安为都城,前后共二百余年。王莽篡汉,另立新朝,仍以长安为都,只是改长安为常安,其他皆依汉时旧规。新莽之后,更始和赤眉也相继在此建都,赤眉曾焚烧宫室,发掘园陵^③。这是长安最初受到的破坏。

东汉都于雒阳,长安虽废不为都,然先朝宗庙陵寝所在,光武和明、章诸帝仍不时临幸,尤以光武帝的临幸最为频繁,前后不下五次之多^④。既有帝王临幸,则旧日宫殿台榭自应即时修整,不使稍有荒芜。其时班固撰《两都赋》,张衡撰《两京赋》,所谓西都和西京皆是指长安而言。两赋皆铺陈长安风物,上自宫殿,下至闾里,详为描述,还仿佛西汉当年,未见差池。班固撰赋,已在安帝之时,张衡更在其后,东汉已臻中叶,将及百年尚完整如昔,这是应该称道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宫室·建章宫》引《关中记》。

② 《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附班固传·章怀注》引《三辅黄图》:“上林有建章、承光等十一宫”。

③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④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这五次是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十一年、十八年、二十二年和中元元年。

的。

东汉末年,董卓迫献帝迁都长安,由于长安宫殿稍有残缺,略感困难^①,不过大体似仍依旧,故当迁都之时,王允还悉收欽雒阳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②,还仿佛承平之世,不愁无地安置。就是董卓被诛,李傕、郭汜战乱初起之时,献帝还能从容因太学行礼,亲自去到永福城门临观其仪^③。可是接着就是更大的破坏。后来献帝被逼东归,行到新丰(今临潼县东),郭汜竟使人夜烧献帝所幸的学舍^④。远离长安的新丰尚且如此,长安城内就更难说了。当战乱未起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⑤。据说当时尚有数十万户。由于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⑥。人烟稀少到这样程度,长安城中原来的建置设施,就更容易破坏,不仅宫殿残缺,就是闾里也难得完整。

中间经过曹魏的几十载,到了西晋初年。潘岳被任命为长安令,由洛阳西行,到了关中。他写了一篇《西征赋》,叙述沿途和在长安城中所见。赋中很称道关中的富实:“蹈秦郊而始辟,豁爽垲以宏壮,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可是对于长安城,所见的就是另一种景象。他“巡省农功,周行庐室”,所见到的,却是“街里萧条,邑居散逸”。当时城内也有些“营宇寺署,肆廛管库”,这是说城内的官署衙门和商店铺户,可是这些却“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这是说,这些官署衙门,商店铺户,都聚集在狭小的地方,和以前比较起来,简直还不到百分之一。他接着说:“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涂荡,亡其处而有其名”。这里所说的是八处闾里的名称,都曾经有名于当世。汉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宫室三》。

② 《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

③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④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⑤ 《后汉书》六六《王允传》。

⑥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宣帝在民间时,就常在尚冠里^①。这些闾里的名称,潘岳都是知道的,可是仅仅知道名称,实际的地方早已磨灭,无从问讯了。他还提到“階长乐,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紫吸娑而款骀,荡輶、枿诣而辘承光”,还有柏梁,都是台榭,太液则是的池沼。这些宫殿和台榭,他都去看过,而且还在太液池划过船。在这地方所见到的乃是锦鸡在孵育雏鸟,狐兔在营窟,因而使他感到朝代灭亡的惨痛。他还特别指出:原来挂在太庙的洪钟,因为庙毁了,钟也摆在地上。作为悬钟架子的乘风也委弃而无所用了。这时禁省之中到处都长了茂草,宫中原有秦始皇时所铸造的金人,就是所说的金狄,早就被移置于霸水侧畔,无所用之。这些都是潘岳所亲眼看到的,并非随便乱说。后来撰《三辅黄图》的人,叙述了许多宫殿台榭,竟然把吸娑、骀荡、枿诣都当作故宫,甚至承光也没有提到。可见废毁已久,连形式和名称都被人弄错或遗忘了。

西晋曾经两次以长安为都;一次在晋惠帝时,一次在晋愍帝时。晋惠帝为其河间王颙所挟,西迁长安。在长安时以征西将军府为宫^②,可知其窘状。愍帝以长安为都是在永嘉乱离、洛阳失陷之后。当时长安虽称都城,实际上“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③。这样的景象还不如一般州郡治所,怎么能说是都城的所在。

西晋以后,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和后秦皆曾经以长安为都城,后秦且改长安为常安。南北朝后期,西魏和北周也曾经以长安为都城。至隋氏始于龙首原上另建新的长安城。

十六国时期,兵戈扰攘,迄未断绝,长安不时成为争夺中心。北魏后期,也时有乱离,“崑潼已西,烟火断绝”^④,对于曾经作为都城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② 《晋书》卷四《惠帝纪》。

③ 《晋书》卷五《愍帝纪》。

④ 《魏书》卷一〇《地形志上》。

的长安,难免又遭到摧残破坏。不过像阿房宫、未央宫、长乐宫这几座规模宏大的宫殿,还能保持许久,偶尔也有人稍加修治,也是难得的盛事。

秦时的阿房宫,于汉时摒于长安城外。因为位于城外,汉时就不以之作为处理政务的场所,前赵以后以长安为都城者亦莫不如此。前秦苻坚虽亦不以阿房宫为议政之所,然以其时谣言所说:“风皇风皇止阿房”,因于阿房植桐竹数十万株,以待风皇的飞止。及慕容冲叛前秦,犹据阿房与苻坚相抗衡^①。后来到了隋末,李渊起兵太原,西抵关中,李世民就先屯驻于阿房^②。阿房成为军事据点,可能是因其地势稍显得高昂,和其原来的宫殿似无若何关系。据唐时记载,阿房宫的旧址,其时仅西北三面有墙,南面已经无墙,宫内悉为民田了^③。

长安城的长乐宫和未央宫较之阿房宫,在十六国之初似尚未残毁。刘曜曾于长乐宫东立大学,于未央宫西立小学,在其中受教者千五百人^④。据说,刘曜还曾修治过未央宫^⑤。石虎更征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⑥,苻坚也曾置听讼观于未央宫南^⑦。据说西魏以后,对这两座宫殿都曾经重修过^⑧。李渊在太原起兵,来到长安,即屯于长乐宫^⑨。自此以后,长乐宫再未见诸记载,宋敏求《长安志》亦只记其遗址所在的方位。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曾从上皇置酒于未央宫^⑩,可知当时未央宫尚有相当规

①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②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③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长安》。

④ 《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

⑤ 《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三《西安府》。

⑥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

⑦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⑧ 《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三《西安府》。

⑨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⑩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一〇》。

模,可为朝廷正式宴会之所。唐敬宗宝历年间(公元825—826年),还曾修治过^①。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因游畋至未央宫,见其遗址,下诏修葺。当时尚有殿舍二百四十九间,又作正殿曰通光殿,东曰诏芳亭,西曰凝思亭,并立端门,还命翰林学士裴素撰记。此事见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②。后来程大昌指出:“会昌间修治之时,既称遗址,则故屋之下存者多矣。又别立两亭,皆非旧名。独内门之扁揭未央旧目,则所谓二百四十九间者,其为刵造必多”^③。程大昌所说是很有道理的。经过会昌年间修治增建,未央宫应该焕然一新。会昌年间下距唐亡之时,只不过六十多年,也许到那时未央宫还未完全圯毁。

汉以后的长安城内也不断有所建置。刘曜就曾起过光世殿和紫光殿^④。前后秦都有太极前殿。太极殿之名起自晋愍帝,在长安南门^⑤。晋愍帝建都于长安之时,城内已经十分残破。如何还能新起宫殿?长安城南面三门,安门居中,安门之内,东为长乐宫,西为未央宫。在何处另建太极殿,颇滋疑义,也许是就长乐宫或未央宫中某些殿改名的。北周新建的宫殿最为繁多^⑥,为十六国以来所少有的。

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后期,长安城内更有小城和皇城的建设。小城始见于前秦苻健之时^⑦,皇城则为北周的建置^⑧。揆之当时实

① 《雍录》卷二《未央宫至唐时尚存》。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禁苑内苑章》。

③ 《雍录》卷二《未央宫至唐时尚存》。

④ 《晋书》卷一〇《刘曜载记》。

⑤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后汉晋秦魏周宫殿章》。

⑥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后汉晋秦魏周宫殿章》,又王仲牟《北周地理志》卷一《京兆郡》。

⑦ 《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记》。

⑧ 《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际情况,所谓小城、皇城殆皆不出于汉时未央宫^①。长安城自西汉之后,历经丧乱,多所废弛,未央宫并曾为赤眉所摧残^②,但迭经修治,直至唐初,尚可应用。其中间多有改称,仍因时为议政之所。由于地位的重要,可能还有一些防御的设施,故以小城和皇城相称,以别于长安城的大城。

长安城的最后废毁乃在隋代初年。隋文帝以长安故城本汉时旧邑,年代久远,凋残殊甚,水皆咸卤,不适居人,而宫殿制度狭小,不足以建皇王之邑,因于龙首原另建新都。新都亦称长安。北周旧都因改称长安故城。迁都之后长安故城并灌为陂,唐宋时人因称其地为涨陂^③,长安故城既已湮没,未央宫以原来是凿龙首原建立的,地势稍高,幸免于残毁,故唐敬宗、武宗皆能修治之,不仅保存,还显得完好。今未央宫亦圯毁无余,仅原来的长安城垣,断断续续,耸立地上,于荒烟蔓草之中,显示其为故城遗址所在而已。

① 拙著《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后汉晋秦魏周宫室》引《帝王世纪》。

③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长安》。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Changan City in the Han Dynasty

Shi nianhai

As the capital of the Han Dynasty, Changan C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cal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crete reasons of thriving and declining of the city.

To Venfy the Nine Prefecfures in Xishan on Minjiang During Tang Dynasty

Guo Shengbo

The Tang Dynasty set up many Ji Mi Zhou(羁縻州) in Xishan Mountain area on Minjiang River. Among them the nine Ji Mi Zhou of Yi (翼)、Tu(涂)、Wei(维)、Zuo(笮)、Yan(炎)、Che(彻)、Ren(冉)、Qiong(穹)、Xiang(向), Which were in jurisdiction of Maozhou(茂州) Dudufu, were set up earlier and had their own longer history, More profound influence.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makes research on the nine jimizhou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situations, communications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s, taking the thirteenth year of Zhen Guan (贞观)period (A. D. 639) as a section of tim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es and Backgrounds of the Changes of the Hong ze Lake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

Han Zhaoqing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processes and backgrounds of the changes of the

• 249 •